

# 严谨治学、淡泊名利

——访林富德教授

刘金塘

**【人物简介】** 林富德,1925年生于上海,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7~1974年先后在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校从事统计教学工作。1974年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从事人口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80年代以来,曾到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美国等国家进行学习、考察;1991年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发展中心、伊利诺埃大学社会学系、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历任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1982年和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及2000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等专家咨询组成员。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第三、四届顾问、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委员会理事、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人口文化促进会学术委员等。

20多年来,先后出版了《生与死的度量》(辽宁出版社,1987年)、《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1950~1978)》(合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农村人口与发展的新格局》(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年)、《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人口通论(下册)》(合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编写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概论》、《人口统计学自学考试提纲》、《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生育率词条)、《人口学辞典》(人口统计部分词条)等人口统计学教材及工具书。发表了《从计划生育到孩次可变型生育模式的建立》(《人口研究》,1988年第6期)、《婚龄变动对生育率的影响》(载于翟振武主编:《人口数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外文出版社,1992年)、《评总和生育率》(《人口研究》,1984年第6期)、《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人口研究》,1987年第1期)等有关人口分析方法、生育率转变、人口预测、全国及地区人口发展前景等方面的论文、咨询报告70余篇。

**刘金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早在1979年初您就和刘铮、邬沧萍教授合作发表了《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以下简称《五点建议》),当时进行这项研究的背景是什么?

**林富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70年代前期,我国开始严格控制生育,1973年12月在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它首先在城市,然后在农村,得到相当多育龄妇女的积极响应,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降到保持了10年之久的20%以下。当时的人口决策与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理论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需要控制人口,如何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二是方法论问题。人口发展的趋势也能预测吗?如果在全国普遍都能实现“晚、稀、少”,那么,我国人口发展将出现什么态势?这篇报告是由我和刘铮、邬沧萍教授合作完成的,报告中体现了我们当时的很多研究设想。

**刘:**这篇报告在中国人口学史上很有影响,当时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果秀真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您能具体谈谈这篇报告的创新之处吗?

**林:**具体讲有五方面的创新:(1)《五点建议》中明确提出“大力禁止三胎,提倡一对夫妇

生一个孩子”。比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提前了1年多。(2)提出控制人口应以思想教育为主的观点。用经济手段控制人口是必要的,但不是惟一的,也不是万能的。特别提出不要迷信经济手段,国家能用于计划生育的资金是有限的,当物质鼓励或制裁办法对家庭生活无足轻重时,用经济手段控制人口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很大。为此,建议用各种方法大力宣传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在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中增加人口教育方面的内容。(3)第一次估算了新中国劳动力的培育费用。这是由刘铮、孙兢新和我一起做的。1978年我们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深入到幼儿园、中、小学等单位搞调查,从妇女孕期检查开始,就产假误工、孩子从幼儿到初中的教育投入、医疗支出、城市建设投资及孩子16岁前家庭为其支付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分市、镇、农村三类地区测算。根据估算出的培育费用匡算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6亿人口,国家、集体和家庭一共负担的抚育费为1万多亿元,占新中国成立后累计国民收入总额的30%左右。(4)第一次提出建议在全国建立常设的“人口委员会”来统筹人口发展,拟定人口规划,开展各种有关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人口发展的经验。(5)提出了我国人口要实现“静止”的设想。报告对人口发展前景进行了估计,指出我国人口今后仍然会有很猛的增长势头,要实现人口“静止”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后来成为人口管理部门制定远期规划的目标设想。

刘:《五点建议》中明确提出“大力禁止三胎,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这个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林:这个观点的思想源头,来自于我们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当时,我们参与过北京市计划生育部门的人口规划工作,见到城市育龄妇女对于落实“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有极大积极性,使全国城市出生率从1972年的19.3%降至1978年的13.6%。北京市当时的计划生育宣传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7年我们在北京市宣武区进行调查时,到计

划生育先进单位北京市服装三厂,当育龄妇女们听到“最好生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宣传后,就有26人(占全厂已婚育龄妇女的5%)提出“我们只要生一个”的倡议,该倡议受到很多女工比较集中的单位的响应,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当时并没有妇女年龄结构和生育的资料,我们通过对宣武区1/7的人口进行调查,得到了妇女年龄结构和生育状况的资料。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我发现有百分之十几的已婚育龄妇女在生完一孩,9年或10年之后,还没有生第二个孩子,说明这些妇女可能并不想要第二个孩子。北京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同志也谈到很多家庭孩子到十几岁时,妇女还在育龄期,但她们不再要孩子。这两件事给我很大震动,使我们认识到城市女职工未必认为是“生两个正好”,妇女中蕴藏着极大的控制生育的积极性,她们能够理解个人生育与国家困难之间的联系。后来,在讨论《五点建议》时,我们提出可以提倡生一个,抑制多孩生育,可能是控制人口急剧增长的有效途径。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建议符合国情,对于刹住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转变传统生育观念,推动少生、优生政策的贯彻落实起到了久远的影响。

刘:当时如何想到要估算劳动力培育费用?

林:50年代以来,由于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都是从算经济账入手,解释劳动人民贫困的来源,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以及当时的一些学者(如吴景超、陈长蘅、孙本文、赵承信等)论及的文章,也主要从消费、积累的关系中,论述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从对马寅初进行错误批判之后,为避免“马尔萨斯”之嫌,人们对“算经济账”讳莫如深。从5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理论研究出现了近20年的“断档”。那么应该如何向全民解释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呢?当时进行的真理标准的讨论给我们以启示,要把家庭决策与国计民生结合起来,应该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算经济账。从婴儿成长为劳动力,需要投入多少培育费用,其中家庭、社会各负担多少,前者影响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后者制约社会积累。那时候我国的劳动力已经很富裕,劳动力培育费用,击中了人

口增长对社会消费与积累、人口与发展之间的结节点,易于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理解并接受。这项研究成果受到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被一再引用,赢得了极好的社会效益。

刘:《五点建议》中的很多观点确实都是开拓性的,即使现在读来仍有现实意义。比如,控制人口应以思想教育为主的观点,与后来从实践中总结的“三为主”经验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建立人口委员会的建议在实际中也基本被采纳,现在各地都有一个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机构,上海市已经把计划生育部门和人口管理完全合并起来,正式成立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您20多年来进行人口研究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林:很多东西是通过实践慢慢认识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到,研究人口问题要搞调查研究,很多问题不到现场是体会不到的。深入实际、探索规律,是人口研究为决策服务的关键。70年代以来,人口研究在我国参与国际人口活动、加强人口管理中应运而生,我们的研究一直与国家的人口决策、管理紧密联系,向实际学习,为人口管理部门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把握人口发展的动向,研究它的规律性。

我们曾经为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以及一些省、市的人口管理部门办过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习班,或应邀讲学或合作研究,这不仅是为实际服务,而且教学相长,我们从中了解国情、民意,进而建立信息网络,和实际部门的同志交朋友,选择研究课题,检验理论,探索对策,并从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美国资深人口学家 Ronald Freedman (Michigan 大学教授)曾经说过,中国人口学家能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写出论文来,这是值得赞赏的。

刘:《五点建议》中对我国的人口发展前景进行了估计,当时做这些估计用的技术和方法是什么?

林:当时做的预测很粗糙,还称不上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口预测。我们根据所能得到的人口资料,也是用人口年龄移算的办法,估计出每年的出生人口,但由于缺乏资料,没有把年龄别的死亡率考虑进去,只是在计算总人口

时考虑到了死亡率的因素,用粗死亡率打了一个折扣。一方面,那时候我们对现代人口分析技术还不太懂,直到80年代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之后,接触到的最早的人口学著作,如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Demography*, 都没有很详细介绍人口预测技术。1980年 A. J. Coale 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讲学才接触到模型生命表技术。另一方面,人口数据很缺乏,做人口预测所需要的人口年龄结构、生育率和死亡率等基础数据不完整,质量也不高。当时能够得到的惟一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是公安部户籍统计部门提供的,同一时期宋健、于景元教授也在做人口预测,当时依据的也是公安部所提供的这个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由于这个资料是依据部分先进地区所提供的数据汇总的,因此,低年龄组人口的比重比实际要低,这对预测结果有很大影响。

刘:人口预测一直是您的研究方向之一,出生人数预测是人口预测中的核心部分,各种不同人口预测方法的差别也主要是在出生人数的预测方法上。早在70年代,您和刘铮、查瑞传就提出了预测出生人数的标准生育率法,它被写进了人口统计学,被众多的人口学词典和人口统计教材所引用。这种方法是如何提出的?

林:标准生育率法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70年代初我和刘铮同志到无锡参加一个全国计划生育学习班,会上江苏省如东、无锡和河北省乐亭三个计划生育先进地区介绍他们做人口预测和规划的经验。其中,如东县做得最好,他们以乡(当时是人民公社)为单位做人口预测,考虑到出生人口的变化与进入婚龄的结婚人数有关,女青年结婚有可能要离开本地,而男青年是“永久牌”,结婚以后仍居住在本地,所以,他们以男青年为基数来推算乡范围内人口的发展。把男青年分成未婚即将进入婚龄、已婚未育、已婚有一个孩子、已婚有两个孩子四类。根据当地结婚、生育一孩、二孩时间分布的经验数据,分别推算不同类别的出生人数。这种方法紧密与计划生育政策相结合,并为经常的计划生育服务,但是有明显局限,它只适应于基层(即当时的公社、大队),不能在更高层次上推广。如

果把人口预测作为人口规划的基础,这些方法只能由下而上测算,无法与由上而下的预测相结合,这显然不能满足当时从宏观上调控人口增长的需要。于是,我们通过对这些方法的改造,并在北京市进行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标准生育率的测算法。标准生育率法用了同批人的概念,考察一批人的结婚时间分布,初婚到初育的时间分布,一孩到二孩的生育间隔分布,根据在各个年龄上的初婚比例、初育比例和一孩到二孩的间隔比例,就推算出人口预测所需要的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

刘:标准生育率法有什么优点?

林:标准生育率法的最大优点是它可以和计划生育政策直接联系。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涉及到妇女的生育孩次、生育间隔等方面的内容,用标准生育率法可以很方便地推算出实施某种人口政策对应的妇女生育率。比如,7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具体要求就是提倡妇女不早于23岁结婚,生育孩子不超过两个,间隔不少于4年,根据这一政策要求,通过调整不同年龄上的初婚比例、初育比例和一孩到二孩的间隔比例,可以给出该政策对应的标准生育率,考察某种人口政策长期执行后的人口发展远景。利用这种方法,我们曾经对北京市和全国人口形势进行过多次预测,为分析人口形势,制定全国人口规划提供了依据。另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所需要的数据很容易通过调查,或从现有的资料中得到。在建有育龄妇女生育卡的地区,只需整理已有的婚姻、生育史资料,就能得出建立模型的基本数据,它具有简便易行,容易推广的优点。越是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地区,预测结果越准确,因为初婚、初育比较有规律。计划生育工作差,多孩盛行的地方,适用性较差。后来,我们对标准生育率法做了进一步的改进,除了考虑影响生育的人口内在因素,如初婚率、初育率、间隔率、不育率等,还用了一个调节系数考虑了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称为孩次可变生育模式。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计划生育效果的不平衡状态,使各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城镇与乡村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婚育观念有明显

差别,孩次可变生育模式在反映生育率变动一般趋势的同时,又能适应这种差别。

刘:标准生育率法是我国人口学家的一种创新,它适应了我国人口控制的需要。80年代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几位人口学家,结合中国人口控制的实践提出的年龄别孩次递进模型与标准生育率法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您后来又多次主持做过全国的人口预测,您觉得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今后应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林:预测是任何计划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人口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人口预测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将与时俱进。过去我们所作的全国的和分区域的人口预测曾经为国家 and 各省市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提供过重要的参考,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口预测不仅要继续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服务,而且将会越来越被工商企业所需求,因为像住房、人寿保险、婴幼儿产品、各级学校教学用品、女性消费、老年服务与商品的需求和人口及其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小区域人口发展和具有某些特征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我们传统的人口预测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传统的人口预测技术现在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特别是在生育预测和死亡预测方面,我们也有足够丰富的生育和死亡方面的数据可以利用,而人口迁移预测不论从方法上还是数据的可获得方面都要薄弱得多,而对迁移人口的预测正是小区域人口预测的关键所在。21世纪将是中国人口迁移变动非常频繁的时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利用,我相信在迁移人口预测的技术上也会有所突破。

#### 参考文献:

1. 刘铮、邬沧萍、林富德:《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
2. 林富德:《从计划生育实践到孩次可变型生育模式的建立》,《人口研究》,1988年第6期。
3. 林富德:《深入实际,探索规律是人口研究为决策服务的关键》,《人口研究》,1998年第3期。

(责任编辑:朱犁)